

# 性工作與空間政治<sup>1</sup>

文 | 姚惠耀 |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

陳佩妤 |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

## 前言

2022 年的女學會年會以「性別、空間與（不）移動」為主軸，本場專題論壇探究「性工作與空間政治」。由長年耕耘性產業研究的陳美華（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）擔任主持，並有三篇會議論文發表：第一位是傳播學者康庭瑜（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），她提出對疫情期間線下到線上的性工作者處境觀察；第二位為人類學者曾薰慧（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助理教授），她以傅柯的異托邦概念，分析越南小吃店另類社會秩序的形成；最後則是地理學者楊又欣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）與社會學者陳美華，考察高雄情慾產業周遭居民的想法、行動策略，進行居民與情慾地景關係的研究。

在 2022 年的疫情期間探討性產業的空間政治，有兩大意義。首先，眾所周知的是，在 2009 年大法官釋字 666

號解釋宣告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 80 條的「罰娼不罰嫖」違憲後，2011 年，立法院增修了《社維法》第 91-1 條，授權地方政府得設置性專區。然而，修法迄今已有十年，仍未有地方政府設立專區，也不見中央政府修訂法規。因此，陳美華、楊又欣的性產業周遭居民態度研究，以及曾薰慧對越南小吃店的內、外部空間政治分析，帶領我們釐清性產業的複雜樣貌，並思考被擱置十年的性產業專區議題。

另一意義，則是自 2019 年底，全球籠罩在 COVID-19 疫情之下，臺灣雖被譽為防疫模範生，卻也在 2020 年、2021 年兩度出現具規模的疫情。而且，這兩波疫情，民眾情緒的宣洩出口都指向了性產業，使得性工作者、性消費者成了代罪羔羊。康庭瑜的研究引領我們看見性工作者在疫情底下的遭遇，及其轉換跑道的的方法與困境。

至今，線下、線上的性管制持續

1 本文經本場次論文發表人檢閱修訂。

制約性工作者們。在此情形，我們要如何理解性工作者的處境，並思考臺灣性產業的未來呢？



曾薰慧 (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)

## 越南小吃店作為異托邦

曾薰慧延續博士論文階段的臺灣新住民研究，深入訪談結婚來臺卻離婚或逃跑而被視為假結婚的新住民女性。這個課題涉及婚姻移民與全球社會的再生產過程，以及女性的能動、不能動的緣由。曾薰慧發現，這些移民女性目的是嫁到臺灣，卻意外的進到性產業，在過程中，性產業如何賦予她們生命意義？我們又該如何重新理解這件事情呢？

曾薰慧所探訪的越南小吃店坐落於臺灣中南部的某市鎮，裡頭的女性工作者的工作內容包含陪酒、陪唱。其興盛過程與東南亞、中國的婚姻移民相

關。然而，近年來已較少群聚的狀態，一則因警方取締色情，二則因槍擊案等社會事件，影響店家生意。因此，越南小吃店分散至各處，進到一般的居住環境。而有些婚姻移民來臺的東南亞女性，可能在受到家暴、逃婚之後，進到陪侍小吃店的產業。

不同於高規格的制服店，越南小吃店的空間一覽無遺，前面是餐廳，後面是包廂，簡陋的裝潢讓空間使用有了彈性。此外，這裡的秩序仰賴媽媽桑對外部、內部打交道的能力，與警察、鄰里間都維持友好關係，形成在地社群。媽媽桑與小姐們，則類似親屬關係的雇用關係，如借錢、玩六合彩等。小吃店有自己的規範，小姐們先簽到者可優先服務客人，後廚也會提供餐點。小姐自由使用這裡的廚房和置物空間，就如同處於自家中的客廳、廚房。在小吃店內，沒有依循國家制定的勞動法規，甚至有許多違反《勞動基準法》之處，但這樣的違規並不能簡單以既有對剝削模式的理解論之。相反地，小吃店向我們展現了一種勞動彈性、空間使用彈性的另類面貌。

從外部空間（即小吃店與鄰里、派出所的關係）與內部空間（涉及勞動空間對工作者的意涵）的分析，在曾薰慧的分析中，越南小吃店的存在形成一種另類秩序，誠如傅柯

(Michel Foucault) 筆下的「異托邦 (heterotopia)」。這樣的異托邦並非追求社會完美型態、難以對應現實社會實體位置的烏托邦 (utopia)，而是形成另類社會秩序，並可在實體空間找到位置的異托邦。而越南小吃店有其自身的演化過程，有臺灣在地的，也有東南亞的一面；藉由工作者自身的行動來產生另類秩序，並同時作為社會鏡像，以及質疑社會價值的異托邦。

楊又欣也對曾薰慧提問，異托邦內的社會秩序有何社會意涵？是否扮演了社會安全網的概念，讓消費者走出異托邦後仍可進到原有空間？跨國性觀光客是否以此得到優越感呢？另一位同學則問道，越南小吃店中的國族與性別交織性，以及異托邦及工作的過程，是否賦予工作者權力 (empower) 呢？

雖然研究並未直接涉及國族與性別的交織性，但曾薰慧確實在田野中觀察到，工作者有中國、臺灣與越南籍，臺灣的位階高過其他二者。越南被貼上「敢玩」的標籤，這反而提高了越南籍性工作者的資本。至於賦權的問題，曾薰慧同意確實有造成賦權效果，但她將此狀況導因於工作者作為建構異托邦的關鍵角色，無巧不巧地形成賦權的狀況。不過，在自身的倫理反思上，曾薰慧也謹慎地避免過度浪漫化越南小吃店，而將空間複雜化來看待。

## 性隔離的空間政治

陳美華與楊又欣探究長期與性產業為鄰的居民，如何看待性產業及其從業者、居民又有何理想的性產業治理模式？在研究方法上，他們使用 Google 地圖，以打卡方式，標記出高雄美容護膚店聚集的街道，以及包含娼館、酒店、應召、流鶯等多種性交易服務聚集的廣場，藉此呈現高雄的舞廳、酒家等性產業聚集的現象。此外，他們也在網路上招募受訪者，讓民眾指認住家附近的性產業，並透過訪談與焦點團體收集資料。

多數受訪者認為，性工作者是因為貧窮而進到產業，並對工作者表示同情，如飲料店的王太太看到工作者到 50、60 歲還在從業，感到心酸。餐飲店的林女士則指出性工作者們各憑本事，不應受到性道德評價。另有受訪



陳美華 (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)

者認為空間被過度性化。住在護膚店附近的女性居民常認為工作者太過暴露，會教壞小孩。此外，陳美華發現越南籍工作者被種族化，受訪者對越南性工作者的評價，通常將之貶抑為階級化的他者，如指稱越南女子「很吵」、「沒有文化」、「無法教育」。

接著，楊又欣將紅燈區周遭社區居民的意見分為二類，第一類是自由權利觀，如王先生認為從業者有做生意的自由；另一類是知情同意派，如吳先生談到，居民住在這裡，是知道這些地區的生態，並已妥協，否則便會遷往他處。

在公／私的分界上，居民對性產業是有條件的接受。許多受訪者認為，性工作者拉低社區的品味與格調，情色化社區，致使社區女性被消費者誤認為性工作者。另一方面，性產業被視作「破窗」，居民將暴力等公安事件、治安敗壞歸因於性產業。總結以上受訪者觀點，性產業的負面影響有實質層面的破壞社區環境，以及象徵

層次的階級貶抑。

那麼，性產業要如何管理呢？部分受訪居民將性產業視為必要之惡，主張集中管理。他們認為，性產業不僅須被管理，且要「集中管理」，如同焚化爐、賭場和夜市；另一方面，從業者可明目張膽開店，國家亦可增加稅收。這種「集中管理」的思維，他們將之稱為性隔離——意即區分乾淨、秩序、去性化的高端者，以及失序、不潔、性化的低端者，排除異己。陳美華以一位受訪者的說法問道，若沒有酒駕專區，為何要有「性專區」呢？這是否將性產業貼上標籤呢？二人的研究指出，表面上沒有性專區，但在性產業店家和當地居民進行日常空間使用協商下，已形成「類專區」的效果。工作者與居民形成公共空間劃界的默契，如流鶯被允許聚集在巷弄中被動待客，以此維持社區在外人眼中的觀感。倘若性工作者越界，居民會報警檢舉。

另一方面，居民也有「自我專區化」的現象，如居民葉先生在遛狗時緊盯小狗，避免與小姐對視；更多人則是刻意改變進出社區的動線，減少在公共空間與性工作者的相遇，甚至讓渡部分公共空間的使用權，讓自己成為移動式的去性化專區，產生動態的空間界線。這些默契涉及空間政治，即誰可使用、如何使用公共空間的問題。

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沈秀華向陳美華提問，在訪談的時候是否提及房價問題？而研究者的政策建議是什麼呢？陳美華回應，許多受訪者擔憂房價下跌，但廣場上的房子已漲價，護膚街上的房價也不便宜；但確實存在議價空間。此外，臺北某區知名色情大樓重生，一坪也高達 124 萬，房價未必受到影響。對居民而言，只要社區沒有被劃定為性專區，便可以模糊地來談。至於政策建言，陳美華發現有些居民並不討厭性產業，但擔心社區一旦設成性專區，便沒有轉圜餘地。而最好的政策應是除罪化。試想，若性工作是正當職業，為何還要專區呢？當然，這需要更多的協商與對話。

## 從線下到線上：疫情期間性工作者的處境及其轉換之道

在 COVID-19 疫情期間，康庭瑜留意到「非正典的性」被當作代罪羔羊。一方面，人際接觸的工作模式帶來健康風險；而在全世界健康治理的邏輯與社會輿論中，公共的親密行為、性互動亦成為焦點。許多國家將性工作者視作防疫破口，要求停業或加強查緝，這都促使性工作者面臨經濟風險。

康庭瑜梳理國外研究，發現當政府關閉實體工作空間，性工作者首先轉往美髮、按摩、餐飲等相近產業。但在疫

情下，這些仍是政府優先控管的場所，因此工作者的經濟情況恐怕並未改善。故而，有些轉往家庭勞動，有些轉移到管制較寬鬆的地方繼續從事性工作。另有性工作者轉到線上，包括將色情影片上傳至收費的網路平臺，或是進行線上的性互動。是以，有研究認為轉往線上平臺是性工作者的救贖，可迴避健康、經濟和暴力風險。

而臺灣的境況又是如何呢？在 2020 年 4 月，高雄金芭黎舞廳一名男性臺商確診；2021 年 5 月，萬華茶室疫情爆發。臺灣的性工作者經歷兩波較長時間的停業規管。藉由初步訪談，康庭瑜發現有些性工作者先是轉往其他實體空間，例如管制較不嚴格的縣市，也有尋找同類型的工作。然而，與國外研究發現相似，性工作者對新的雇主、環境及流程並不熟悉，這個策略仍伴隨風險。

有別於國外的研究結果，康庭瑜的受訪者並不認為轉往線上有助於緩解各種風險。這有幾項原因，其一，線下、線上空間並非斷裂的，工作者的資訊在線上公開後，這些資訊便利或促生線下跟蹤騷擾，乃至暴力。其次，線上工作帶來新的風險，如身分指認、未經同意的側錄與影像外流等。第三，臺灣並非只有線下的性規管，線上亦存在相同的管制邏輯。第四，



康庭瑜（國立  
政治大學新聞  
學系）

實體與線上的勞動類型不全然相同，例如熟悉陪侍產業的受訪者表示，數位平臺將主流審美身體一字排開，感到身體更加物化。

現場有學生向康庭瑜提問，線下到線上的性工作者們，是否重新適應環境，並給予詮釋呢？工作者是否找到適應新媒介的方法？此外，工作者是否面臨網路上的色情規範風險呢？對此，康庭瑜指出，有初步觀察到有些工作者發展出媒介選用的策略，來適應新的媒介，比如：工作者若不喜歡直播互動中的情緒勞動，便轉而選擇拍攝影片的途徑。

另一位同學以自身男同志網黃的身分與經驗回應，指出在疫情爆發期間，收入反而提高。對此，康庭瑜尚未觀察到這個現象，其受訪者是以實體為主，不見得打算長久經營線上工作。日

後若樣本數增加，或許會涉及疫情與網黃收入的問題。

## 結語

在這場論壇中，四位研究者分別論及實體與線上性工作者的相似、相異處境，以及性產業場域的鄰里關係。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與思辨，釐清社會對性產業的諸多偏見與誤解。在曾薰慧的研究中，我們看到越南小吃店內部形成的工作型態，與制服店大為不同。陳美華與楊又欣揭示高雄性產業周遭居民的多樣觀感，以及應變之道。康庭瑜的研究則提醒我們，雖然外國研究彰顯線上性工作的許多優點，是實體性工作者的樂觀救贖；但臺灣本地受訪者的經驗，反而提到了線上性產業的潛在風險。

這些研究讓我們看見，性產業相當多元，工作的內容、型態也不盡相同；然而，性工作者們卻得面對相似的社會汙名與法律規範。而同樣受到社會偏見所困擾的，還有生活在性產業周圍的社區居民。他們未必憎惡性工作者，但卻也不見得樂於與性產業相處，事實上，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，摸索、尋找他們與性產業共存的方法。回到前言，在《社維法》第 91-1 條的性專區制度公布十年之後，我們應當來聆聽性工作者、性消費者、性產業經營者及周遭居民等的聲音，重新制定合宜的規範了。